

主观成就心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以 CSSR2014 数据为例

林 曾, 王晓磊

摘 要: 居民生活满意度是衡量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 探寻影响满意度的居民主观成就因素, 能够为进一步改进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以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R2014) 样本为依据, 把人口统计学特征、常见的相关变量为控制变量, 个人自致能力、家庭资本、外部环境为三个核心自变量, 用四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相应的结果。研究发现, 三个主观成就因素均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其中自致能力因素影响最大, 外部环境因素次之, 而家庭资本因素影响最小。

关键词: 生活满意度; 主观成就因素; 自致能力; 家庭资本; 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6)05-0095-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5.010

一、引 言

生活满意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属于心理学层面上的自我认知。生活满意度的主观影响因素可能来源于多个方面, 如对自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感觉良好, 对现阶段的职业活动充满信心, 对家庭关系的处理游刃有余等。概括性来讲, 生活满意度是指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对它的研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生活质量的研究、心理健康的研究和老年学的研究。生活满意度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对于个体心理状态的认知起着关键性作用, 同时它作为社会学领域中关注的重点, 更是为及时了解社会不同群体的心理状态提供充分依据。

本文尝试发现居民个体主观成就因素的选择心态能否对其生活满意度发挥效应, 各类主观成就因素中, 哪一类的因素发挥效应最大, 并对导致结论的原因进行可能性猜想。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文献回顾部分侧重于发现对生活满意度造成影响各类因素, 这也为本文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实证依据。

在定量研究中, 人口统计学变量一直都是作为控制变量的首选。在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定量研究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现代化研究”(117/610400503)

作者简介: 林曾,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湖北 武汉 430072),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终身教授; 王晓磊,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收入、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种族/民族、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也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人均收入的增长一般被认为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农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有国外学者发现了与基本经济理论相符合的研究结果,收入远超平均水平线的农民,其生活满意度得分将会提高 0.22;收入略低于平均水平线的农民,其生活满意度得分将会降低 0.27;而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线的农民,其生活满意度得分则会降低 0.84^[1]。也有学者提出过,当收入水平相对固定时,收入的任何增长对生活满意度都只会产生极小的影响,甚至是没有影响^[2],即“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Helliwell 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许多发达国家,生活满意度至少已经形成了一个平稳的趋势,当收入高于所认同的“门槛”后,其增长对生活满意度不再有显著的影响^[3]。还有学者将收入按照绝对收入(当前收入)、相对收入(与其他人的收入进行比较)和收入的增长(与过去收入相比较)进行区分,进而分别探讨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满意度要低于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4]。收入往往会通过受教育程度进而影响到生活满意度,有学者在控制住收入变量后,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相关影响^[5]。在种族/民族当中,有国外学者指出美国的黑人相比白人,其生活满意度要低很多^[6],这与我们传统上所熟知的种族歧视相吻合。年龄方面,大多文献认可年龄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呈现 U 形状态,即当达到某一个年纪时,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将会降到最低。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婚姻状况等,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样,可借鉴意义并不大。

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外,一些与生活满意度关系较强的变量,如环境质量、期望、公平、宗教服务等也会被考虑进去。在宗教影响方面,Dehejia 等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时,能够更好地维持他们的生活满意度^[7];也有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老年人是否有宗教信仰或是否参加宗教活动与其生活满意度存在强烈的负相关^[8]。环境质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关心的方面,所在地区的空气质量、卫生条件、噪音污染状况等都与生活满意度息息相关。国外很多学者研究过环境质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运用欧洲十国的收入与空气污染的边际替代率来估计空气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9],结果显示空气质量的高低与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相关。国内学者中,曹大宇对我国 18 个城市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与空气环境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空气中二氧化氮的浓度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这种负面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低收入阶层,而对高收入阶层不存在任何危机。公平主要体现在对各种机会的满意程度,如就业公平、收入公平、享有的政治权利公平等,期望则包含众多方面,如收入期望、教育期望、晋升期望等^[10]。

主观成就因素类似于成就价值观,是价值观取向的维度之一。在“Schwartz 价值观量表”中,成就作为 10 个普遍的价值动机类型之一,是指根据社会的标准,通过实际的竞争所获得个人成功,如有能力的,有抱负的。主观成就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较少,可以找到的是辛志勇对山西农民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实证研究。结合质与量的分析,他发现成就取向占据农民价值取向的核心地位^[11]。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结合 CSSR2014 问卷的设置内容,将 12 个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同时由于探索主观成就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很少见,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题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和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假设

为检验主观成就因素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本文分别以“自致能力”、“家庭资本”、“外部环境”作为判定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依据。在众多的成就价值观中,依靠自身实力取得成功是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部分,也是最能得到认可的成功因素,当自致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时,其个人价值得以最大化,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基于此,笔者提出了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 居民认为获取成功的因素中个人“自致能力”重要性越大, 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先赋条件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如我们无法决定家庭出身, 有的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 享受着父辈们为其创造的物质生活; 而有的人则出身贫寒, 要为今后的一生而努力拼命。从某种程度上说, 家庭资本对个人一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它影响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基于以上, 笔者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 2: 居民认为获取成功的因素中“家庭资本”重要性越大, 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国家汇聚人才的基本条件, 也是这些人才得以施展才华的平台保障。拥有自致能力和家庭资本是不足以取得成功的, 如果生于乱世, 个人拥有再出色的才能也可能被忽视, 再资本雄厚的富商也有可能一夜之间破产。可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获得成就的基础。它对于个人生活满意度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居民认为获取成功的因素中“外部环境”重要性越大, 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主观成就价值观内部的各个因素之间缺少明确而合适的比较, 以往的文献中没有涉及过此类的比较研究。笔者通过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对部分居民的访谈, 了解了该部分居民对于这几个主观成就因素间理想排序的情况, 提出了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4: 在获取成功的各因素中, 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所产生的影响大小依次为“自致能力”、“外部环境”、“家庭资本”, 即个人 > 社会 > 家庭。

三、理论框架

生活满意度量表^①包括三个独立的分量表, 其一是他评量表, 即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 (Life Satisfaction Rating Scale), 简称 LSR; 另两个分量表是自评量表, 分别为生活满意度指数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和生活满意度指数 B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B), 简称 LSI 和 LSIB。本研究主要以 LSR 量表的内容作为理论指导, LSR 将个人的价值观念作为评定个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内容, 其中价值观念中涉及关于个人所认可的工作成就价值观的个人能力、社会公平、家庭支持等方面。LSR 认为个人价值观念能够有效地对其生活满意度进行测量。本研究以此作为理论框架 (如图 1 所示), 对研究变量进行数据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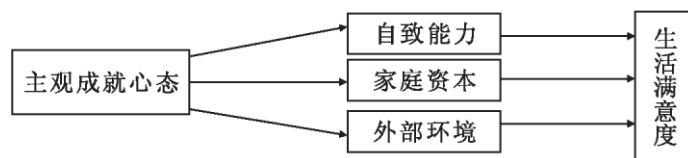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图

四、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自 2014 年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R2014)。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a Social Survey Research) 是武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所发起的武汉市第一个综合性、连续性的覆盖整个武汉市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CSSR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 在武汉市抽取 2 000

^① Life Satisfaction Scales (Neugarten, Hvighurst, & Tobin, 1981)。

个样本,平均分配在武汉市63个居委会/行政村委员会中,最终完成1858份有效问卷。

(二) 数据处理

本文探讨主观成就因素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因此,因变量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对应到CSSR中E部分第三题中的g项“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由于本题为1~10分的打分题目,因此可以将该变量看作是一个连续性变量。自变量是居民主观成就因素,对应到CSSR中F部分的第一题“您认为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一个人要获得成功、取得成就,下列哪些因素更为重要,最重要的打10分,最不重要的打1分”,该题的选项如下:a、家庭背景或出身;b、社会关系网;c、机会或运气;d、个人天赋与能力;e、个人努力奋斗;f、受到良好的教育;g、个人政治身份;h、家庭经济实力;i、父母受教育水平;j、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k、政府好的政策、措施。

本文对使用的资料作了以下技术上的处理。1、对自变量“主观成就因素”进行降维。运用因子分析,将“居民选择获取成功的因素”分为“自致能力”、“家庭资本”和“外部环境”三个新变量。2、将引入的控制变量进行整理。首先是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整理,(1)问卷中的“受访者出生年份”转化为具体年龄;(2)“受访者本人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即1为男性,0为女性;(3)“教育程度”转化为未上学、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4)“政治面貌”转化为党员与非党员;(5)“户口性质”转化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6)“工作情况”转化为有工作和无工作;(7)选取被访者的个人年收入作为经济收入变量,对经济收入取对数再平方后进入模型,以检验经济收入是否存在U型曲线;(8)“婚姻性质”转化为有配偶和无配偶。本研究引入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变量中的缺失值运用均值代替,其他变量中的多余选项均已设置成系统缺失值。然后是常见的相关变量的整理,(1)“个人教育期望”转化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职高/技巧、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2)“社会公平状况”中的“8、不好说”改为系统缺失值。

(三)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数据分析的第一部分,1、描述了控制变量特征,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常见的相关变量特征,其中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户口性质、工作情况、经济收入、个人教育期望、居住地环境状况、信教情况和社会公平状况。2、对自变量主观成就因素分别进行描述性分析。3、对因变量生活满意度进行描述性分析。数据分析的第二部分对自变量主观成就因素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描述。为系统揭示出研究变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本文在研究结果的最后部分对主观成就因素的三个方面与生活满意度分别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五、研究结果

(一)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1. CSSR2014人口统计学特征。从表1中可以看出,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在总体中所占百分比分别是46%和54%,女性

表1 CSSR2014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	指标	频率(%)
性别	男	46.0
	女	54.0
婚姻状况	有配偶	84.1
	无配偶	15.9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5.0
	初等教育	12.3
	中等教育	56.8
	高等教育	25.9
政治面貌	党员	16.3
	非党员	83.7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	47.4
	非农业户口	52.6
工作情况	有工作	57.7
	无工作	42.3
年龄	最大值(岁)	70
	最小值(岁)	17
	均值(岁)	45.1551
个人年收入	均值(元)	39681.76

在样本中的比例略微高于男性, 样本的性别分布较均匀, 基本符合武汉市居民性别比例的实际情况。婚姻状况上, 有配偶的人员比例高达 84.1%, 无配偶的人员占到 15.9%, 样本群体主要为已婚人员。教育程度方面, 未上学和接受过初等教育(小学)占 17.3%, 接受过初等教育(初中、高中、中专或职高技校)占 12.3%, 受过高等教育的武汉市居民在此样本中占到了 25.9%。政治面貌上, 中共党员的比例为 16.3%, 说明样本群体主要为非党员。户口性质方面, 农业户口的比重达到 47.4%, 非农业户口的比重为 52.6%, 城乡样本分布基本平衡。工作情况中, 仅有 57.7% 的人有工作, 剩余的 42.3% 的人暂时没有工作, 这与样本中存在大量的农村居民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农村居民对工作的概念界定不清。此外, 在年龄分布上, 年纪最轻的为 17 岁, 年纪最大者为 70 岁,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45 岁左右。而在个人年收入方面, 武汉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接近 4 万元。总体来看, CSSR2014 的数据样本比例较为平衡,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 文献中常见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如表 2 所示, 个人教育期望变量的四个选项中, 期望自己受到初中及以下教育

的居民比例为 7.2%, 期望自己受到高中水平教育的居民比例为 14.2%, 期望自己受到大学教育的居民比例为 62.3%, 这一选项的期望程度最高, 期望自己受到研究生教育的居民比例达到了 16.3%, 位居次席; 居住地环境状况中, 用 1 至 10 分为总体居住环境状况进行打分, 1 分最低, 10 分最高, 得出的平均满意结果为 6.8 分; 在有无宗教信仰的这一变量上, 仅有 7% 的武汉市居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关于总体的社会公平状况, 有 59.9% 的武汉市居民认为当今社会处于一个公平的状态中, 仍有 40.1% 的居民认为当今社会存在一定的不公平现象。

3. 主观成就因素的描述性分析。如表 3 所示, 武汉市居民在为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进行 1 至 10 分的打分时, 各项因素分数均较高, 其中个人努力奋斗和良好的教育平均值达到了 8 分以上, 还有 8 项因素平均值达到了 7 分, 1 项因素的平均值达到了 6 分。从该表中可以初步看出, 武汉市居民认为一个人想要取得成功, 是各种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4. 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描述性分析。如表 4 所示, 武汉市居民在对生活满意度进行 1~10 分的打分中, 分数在 7 分左右。可以初步看出, 武汉市居民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较高。

表 2 常见相关变量特征

个人教育期望	指标	频率 (%)	
	初中及以下	7.2	
	高中/中专/职高/技校	14.2	
	大学(专科、本科)	62.3	
	研究生(硕士、博士)	16.3	
居住地环境状况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1	10	6.80
信教情况	指标	频率 (%)	
	有	7.0	
	没有	93.0	
社会公平状况	指标	频率 (%)	
	非常不公平	4.6	
	不太公平	35.5	
	比较公平	57.4	
	非常公平	2.5	

表 3 武汉市居民认为的主观成就因素

选项	均值
家庭背景	7.45
社会关系网	7.78
机会或运气	7.06
个人天赋与能力	7.81
个人努力奋斗	8.36
良好的教育	8.11
个人政治身份	6.69
家庭经济实力	7.40
父母受教育水平	7.02
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	7.72
政府好的政策措施	7.86

表 4 武汉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整体生活				
满意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N=1 856)				
	1	10	7.24	1.755

(二) 居民主观成就因素的因子分析

武汉市居民认为获取成功的因素中选项庞杂,各因素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联系。因此,在构建回归模型之前,要先对这些因素运用因子分析进行降维,简化研究变量。表5为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其结果显示,以上11个因素的因子分析的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显著,KMO值为0.861,效果较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表6为提取的三个因子所能解释的总体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了63.939%,提取效果明显。

如表7所示,在旋转后的成分矩阵中,因子一中“个人努力奋斗”、“个人天赋与能力”、“良好的教育”、“机会或运气”(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得分较高,将其归为一类,命名为“自致能力”因子;因子二中“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家庭经济实力”、“父母受教育水平”得分较高,将其归为一类,命名为“家庭资本”因子;因子三中“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政府措施”得分较高,将其归为一类,故命名为“外部环境”因子。

表5 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861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7 660.992
	df 55
	Sig . 0.000

表6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4.605	41.867	41.867
2	1.414	12.855	54.722
3	1.014	9.216	63.939

表7 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个人努力奋斗	0.836	0.017	0.261
个人天赋与能力	0.813	0.181	0.228
机会或运气	0.617	0.423	0.073
良好的教育	0.573	0.186	0.462
家庭背景	0.120	0.819	0.045
社会关系网	0.347	0.727	-0.024
家庭经济实力	0.076	0.624	0.461
个人政治身份	0.051	0.504	0.426
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	0.329	0.034	0.779
政府好的政策措施	0.352	0.052	0.753
父母受教育水平	0.067	0.483	0.591

(三) 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运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总体的生活满意度分别建立四个回归模型,模型一是八个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户口性质、工作情况、年龄、婚姻状况、收入)与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四个相关变量(个人教育期望、居住地环境状况、信教情况、社会公平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二至模型四均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即在控制了12个变量后,分别加入“自致能力”因子、“家庭资本”因子和“外部环境”因子,其目的在于考察这三项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排名。

本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 + \mu_i \quad (i=1, 2, \dots, n)$$

其中 Y 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即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 $X_{1i}, X_{2i}, \dots, X_{ki}$ 是本文的自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和较为常见的与主题相关的变量等控制变量,以及三个核心自变量,即主观成就心态变量。 K 为解释变量的数目。 $B_j (j=1, 2, \dots, k)$ 为回归系数(Regression Coefficient)。

在四个回归模型中(如表8所示),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个人收入一直发挥着显著作用。其中,女性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男性,党员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非党员、有配偶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无配偶的居民,居民收入越高,其生活满意度也会相应提

高。文献中较为常见的相关变量中, 居住地环境状况和社会公平状况也一直有着显著影响, 发挥着正向相关的作用, 即居住地环境状况越好,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社会整体越趋近于公平,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以上这六个显著的控制变量能够较为全面地说明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各个方面,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模型 I 中 R^2 值为 0.232, 说明在这六个较具代表性的变量的控制下, 回归模型能够解释出因变量的 23.2%。

表 8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统计结果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控制变量=人口统计特征+常见相关变量	控制变量+主观成就因素 (自致能力)	控制变量+主观成就因素 (家庭资本)	控制变量+主观成就因素 (外部环境)
性别 (参照组: 女性)	-0.180** (0.090)	-0.168* (0.089)	-0.187** (0.090)	-0.162* (0.090)
教育程度	0.078 (0.082)	0.074 (0.081)	0.093 (0.082)	0.089 (0.081)
政治面貌 (参照组: 非党员)	0.278** (0.119)	0.244** (0.118)	0.276** (0.119)	0.251** (0.118)
户口性质	-0.094 (0.097)	-0.110 (0.096)	-0.075 (0.098)	-0.058 (0.097)
工作情况	0.045 (0.095)	0.035 (0.094)	0.041 (0.095)	0.064 (0.094)
年龄	-0.002 (0.004)	-0.001 (0.004)	-0.003 (0.004)	-0.002 (0.004)
婚姻状况 (参照组: 无配偶)	0.230* (0.121)	0.204* (0.119)	0.217* (0.121)	0.236** (0.120)
个人年收入	0.240*** (0.051)	0.228*** (0.050)	0.244*** (0.050)	0.239*** (0.050)
个人教育期望	0.031 (0.068)	0.011 (0.067)	0.022 (0.068)	0.031 (0.067)
居住地环境状况	0.347*** (0.024)	0.320*** (0.024)	0.342*** (0.024)	0.329*** (0.024)
是否信教	0.007 (0.167)	-0.002 (0.165)	0.016 (0.167)	0.021 (0.166)
社会公平状况	0.502*** (0.071)	0.475*** (0.070)	0.515*** (0.071)	0.492*** (0.070)
自致能力		0.253*** (0.043)		
家庭资本			0.091** (0.043)	
外部环境				0.204*** (0.043)
模型 I	$R^2=0.232$ $F=33.353$			
模型 II	$R^2=0.251$ $F=34.205$			
模型 III	$R^2=0.235$ $F=31.218$			
模型 IV	$R^2=0.245$ $F=33.05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S.E.)。

由于本文侧重于探索这三个主观成就因素对武汉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排名, 因此以它们各

自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实际上,鉴于本文核心自变量单位的统一性,可以将其回归系数用于比较分析)和 R^2 解释力度为标准进行区分。回归系数方面,在满足所有相同的控制条件下,这三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是0.253、0.091和0.204,即当控制变量在模型Ⅱ、模型Ⅲ、模型Ⅳ分别固定时,“自致能力”每提升一个单位,武汉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便提升0.253个单位;“家庭资本”每提升一个单位,武汉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便提升0.091个单位;“外部环境”每提升一个单位,武汉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便提升0.204个单位。从结果中能够看出,自致能力(0.253) > 外部环境(0.204) > 家庭资本(0.091)。

从 R^2 值来看,模型Ⅱ至模型Ⅳ中,分别加进这三个自变量,模型 R^2 值分别为0.251、0.235和0.245,即回归模型能够分别解释出因变量的25.1%、23.5%和24.5%,与模型Ⅰ相比均有提升。提升幅度分别为1.9%、0.3%和1.3%,即自致能力(1.9%) > 外部环境(1.3%) > 家庭资本(0.3%),与回归系数的推断结果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在武汉市居民选取获得成功的因素当中,“个人自致能力”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外部环境”次之,而我们比较关注的“家庭资本”则影响最小。

六、讨论与总结

主观成就心态的选择基于个人对获取成功的认知,这样的认知可能会受到来自不同阶层意识的影响,利用数据分析则可以避免出现不同的分歧,得出较为一致的结果。首先,大众比较认可的成功价值观念是依靠个人的刻苦努力来实现梦想,成功因素论中提出一个人的成功无非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内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个人成就并不一定是借助外部因素来得,但一定是要通过内部因素,即通过努力奋斗来加以实现。因此,无论是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领导,还是街边卖货的商贩,都倾向于将个人自致能力作为首选。对于那些自认为已经成功的居民,他们了解自身获得成功的艰辛。对于那些仍需要证明自己的居民,他们内心会有一种获取成功的坚定信念,即依靠个人的努力奋斗来实现自我价值,而这样的信念会让这些人对生活保持热情、充满希望。

其次,上述提到,成功需要内外部因素结合方可。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政府好的政策、措施,无疑是作为个人实现梦想,取得成功的加速剂。有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加之外部环境的推动,可以让那些等待梦想起航的人保持平稳的心态,避免不必要的失范心理和失范行为的出现。

第三,当今的社会阶层分化较为严重,在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中下阶层的居民占据较大比例。调查对象中,有富人家庭,也有低保家庭。当问及此题时,家庭资本因素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作用最小,这里可能涉及的心理是处于武汉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居民,家庭资本不足,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奋斗上,因此,家庭资本是比较靠后的选择;而处于武汉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那些依靠自己白手起家的人并没有借助过家庭的力量,而借助家庭关系取得成就的人可能并不觉得自己今天的成绩很光彩。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家庭资本因素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不如自致能力和外部环境显著了。

武汉市居民的主观成就因素的选择心态,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这种“自致 > 外部 > 家庭”的结论能够为政府制定和实施人才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在个人奋斗的基础上,适当性地降低家庭资本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努力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无论对于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这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参考文献

- [1] Knight, J., L. Song, R. Gunatilaka.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tions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

conomic Review, 2009, (4).

- [2] Eastern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27).
- [3] Helliwell, J. F.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J]. *Economic Modelling*, 2003, (2).
- [4] 宋丽娜, 西蒙·阿普尔顿. 中国城市地区的生活满意度: 构成要素与决定因素[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 (6).
- [5] Alesina, A. , R. Di Tella, R. Mac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 [6] Blanchflower, D. , A. Oswald. Well-being over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 [7] Dchejia, R. , T. DeLeire, E. Luttmer. Insuring consumption and happiness through religious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1).
- [8] Philip, H. , B. Tierney. Relig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9, (38).
- [9] Welsch, H. Environment and happiness: Valuation of air pollution using life satisfaction dat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58).
- [10] 曹大宇. 环境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1, (21).
- [11] 辛志勇. 山西农民价值取向与生活满意度及其关系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06.

(责任编辑 孙 洁)

MAIN ABSTRACTS

Comparative Study on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USA

HU De-sheng, WANG Tao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water function zone, one of three core factors in the Most Stringen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cosystem in China, and to people's health as well. To achieve the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go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effect between China and USA, and concludes that China could perfect its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two aspects: (i) improving the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laws and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i) strengthening long-term effective mechanism of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Impact of Subjective Achievement Mentality on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 Wuhan

LIN Zeng, WANG Xiao-lei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ocial governance effect.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social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social conditions in Wuhan city, with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 related variables as control variables, personal ability, domestic capital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gether with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our correspond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ree subjective achievement factor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among whic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the biggest influence, and domestic capital has the smallest influence.

Magnate Ranking List and Company's Earnings Management: Prestigious or Backfired?

YU Ming-gui, WAN Long-xiang

By utilizing the debut in "Forbes China Rich List" of actual controllers of companies as an exogenous even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ompany's earnings management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list announcement. Through studying existing literature on medi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paper presents two competing hypotheses: through market pressures impact from the media, actual controllers on the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will enhance accru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market supervision impact from the media, actual controllers on the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will reduce accru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paper show that after the actual controller of a company appears on the "Forbes China Rich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media coverage will bring pressure to the company. To ease the pressure, companies may choose to enhance their accru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short term. The result is more obvious for companies whose actual controllers have been on the List for several times.

Modern Value of Chinese Academies' Revival

CHEN Fang-ping, WANG Yan-fa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cademies have lasted for one thousand years and played a huge role in many aspects. As times goes by, academies have gradually faded out, but the core elements of academies still exist and tend to revive in various forms,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people's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but also indicates thei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ith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mind,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cademies.